

被劫掠国宝唐鸿胪井碑 何时“回家”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唐鸿胪井碑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但在1908年，却被以“战利品”的名义非法运至日本，自此远离故土118年。

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中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直为唐鸿胪井碑回归中国而不懈努力。就在今年1月，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联合编纂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下简称《总汇》）在上海

发布，完成唐鸿胪井碑流失日本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完整证据链，还原了日本以日俄战争“战利品”为由，非法劫掠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并将其运至日本的事实。

这本800多页的书系统梳理了迄今存世的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及日本的照片、唐鸿胪井碑题刻拓片、唐鸿胪井碑自诞生至被掠入日本期间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唐鸿胪井碑的研究著述，为唐鸿胪井碑的进一步研究和追索搭建起完整、系统、可靠的史料与文献支撑。

为什么要立唐鸿胪井碑？

1300多年前，为什么要立唐鸿胪井碑？

这得从唐朝初年说起。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建立了地方政权震国，其首领大祚荣自称震国王，后派其子到唐朝官廷任职以示归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同年底改元开元），唐王朝派遣郎将崔忻任鸿胪卿，出使辽东。崔忻率团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都里镇（今旅顺），海陆兼程到达震国都城（今敦化），举行仪式宣谕震国为忽汗州（以其境内有忽汗河得名）并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震国自此正式隶属于唐王朝。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崔忻在返回长安途中于旅顺黄金山麓及西北麓各凿井一口，并在西北麓井旁一块“其大如驼”的巨石上铭刻3列29字：“勅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并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该铭刻位于碑石左上部，面积大约纵35厘米、横14厘米。这就是唐鸿胪井及鸿胪井碑（又称鸿胪井刻石）。据日本海军省档案《唐碑略图》附记和日本学者渡边谅实际测量的数据：整个碑石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约9.5吨。

唐鸿胪井碑石另有7则题刻，



二十世纪初，关重忠拍摄的在旅顺原址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

多为历代官员和学者览碑纪事。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带人筑亭保护鸿胪井碑，并在原刻石左侧又添镌小字五行。碑亭于次年八月建成竣工，横梁上刻有“唐碑亭”3字。

到20世纪初，俄国、日本两国先后占领中国旅顺地区。在此期间，俄国和日本拍摄的旅顺口相关环境的照片中，能够清晰辨认出位于黄金山脚下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此外，日本关重忠等人拍摄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近景照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鸿胪井碑的立面和碑亭结构及相邻建筑。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总汇》主编之一段勇撰文表示，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更有着坚实的文献与影像佐证。更可贵的是，在唐鸿胪井碑于旅顺原址留存期间，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镜头之下，石碑的形制、唐碑亭的风貌清晰可辨，为今日追溯其历史原貌、佐证其文明价值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

流失至日本逾百年

“回望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之际，文脉亦遭重创。在众多流失文物中，唐鸿胪井碑的命运尤为典型。”段勇的这段描述揭示了唐鸿胪井碑的流失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该文件列举了“搜集”中国文物的方法，要求“搜集”、运输、分类各环节均须受军队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以确保“搜集”到的文物由帝国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不幸沦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只得无奈宣布“局外中立”。日军取胜后，随即占领旅顺等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并迅速启动新一轮文物“搜集”，而唐鸿胪井碑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被觊觎的目标。

1905年7月，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受日本海軍部委派秘密到访旅顺，考察唐鸿胪井碑价值，其相关意见被记录在《旅顺唐碑调查报告》中。根据日本学者酒寄雅志在《渤海与日本》一文中的表述，1907年内藤湖南在东京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唐鸿胪井碑“最近在旅顺被发现”。

就在1908年，在旅顺黄金山脚

下矗立的唐鸿胪井碑和碑亭，被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运至日本。据《总汇》主编之一姬巍介绍，日本海军装船运输时，碑亭的体量难以完整吊装，从其原有的照片和到日本的照片对比可知，采用了切割的方式，文物因此受到破坏。

1908年4月，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致侍从武官长的报告所附《唐碑亭记》，还原了这起掠夺的全过程：“唐碑亭由碑和石亭构成，位于旅顺黄金山北麓港口以东数百步处……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我军占领旅顺后……此唐碑亭被搬移到东京，现在宫城内。”

在1908年日本编制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类书》中，也明确记载：“唐碑亭，四十一年四月三十日送至宫中。附言：该物品原位于旅顺黄金山麓。”这是日本将唐鸿胪井碑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劫掠至日本的关键证据。

在1923年日本印制的《官城写真帖》收录的照片中，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被公然置于专门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侧面，亭柱上清晰可见断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造，唐鸿胪井碑在日本的法律身份被扭曲界定为所谓“国有”。段勇表示，这一单方面的法律认定，无法改变、更不可能抹去其作为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的本质。

研究和追索从未停步

100多年来，围绕唐鸿胪井碑的研究和追索从未停步。在《总汇》发布当日签署的《关于呼吁日本返唐鸿胪井碑的上海宣言》中，列举了一连串名字，以铭记他们为研究、追索唐鸿胪井碑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深切缅怀以乔德秀为代表的先驱，于艰难时世中坚守对唐鸿胪井碑的追踪记录，始终秉持国宝必归的坚定信念，为后世追索奠定精神根基；深切感念以韩树英、罗哲文、平山郁夫为代表的前辈，积极推进中日双边沟通与追索协商，凝聚起中日民间守望相助的共识与力量……”

根据《总汇》梳理的“唐鸿胪井碑大事记”，1911年，乔德秀在《南金乡土志》中记载了“鸿胪井”词条：“唐贞观年鸿胪崔忻所凿，在旅顺口黄金山之北麓，刻字于石上。其石今为日本汽船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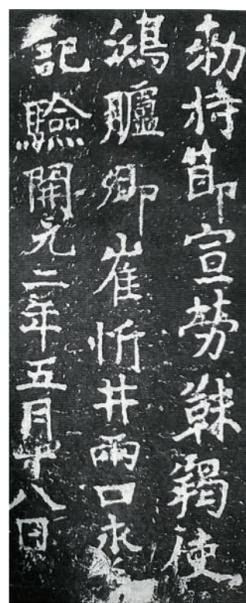
1936年，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其撰写的《满洲金石志稿》中，对刻石的位置、题刻内容、题刻缘由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1978年，《旅大乡土历史教材资料》收录了唐鸿胪井碑的有关情况、拓片等内容。1979年，鸿胪井遗址被列为大连市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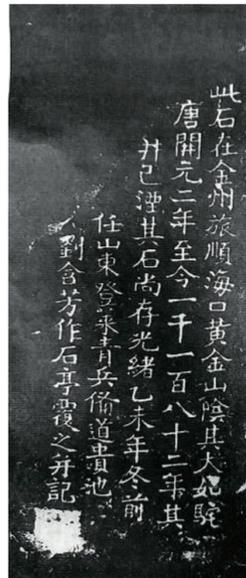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唐鸿胪井碑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2001年，王仁富等志愿者成立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为研究和宣传唐鸿胪井碑，王仁富倾注了后半生心血。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官内厅写信表达慰问之情，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平安否”；同年6月，王仁富收到回函，得知唐鸿胪井碑安全无恙。这件事被记载在《总汇》中的《日本皇官的回信》一文中。

该文作者黄明超是王仁富寄至日本之信的译者。“我们开门见山地问：教授，你为什么多年研究寻访唐



「崔忻题刻」拓片。



「刘含芳题刻」拓片。

鸿胪井刻石？他说，唐鸿胪井刻石是一根没有拔出来的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感到心疼。”黄明超在文中描述的和王仁富的对话表达了唐鸿胪井碑流失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痛。

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是《总汇》编纂方之一，也是推动唐鸿胪井碑研究和追索的社会团队之一。“714指公元714年，是唐鸿胪井碑的诞生之年。”姬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此为名，是想让公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文物的千年历史，从而意识到追索的紧迫性。

段勇表示，唐鸿胪井碑镌刻着中国古代王朝册封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厚重历史，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定位，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标准高度契合。

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破解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出了兼具原创性与可行性的中国方案。

《总汇》发布仪式上，《总汇》编委会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双方共同发表宣言，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纠正历史错误，早日返唐鸿胪井碑。

日前，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等国内外10余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对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境内的西沟遗址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遗址出土的2601件石制品展现出系统化的小石片生产策略和目前已知东亚最早的工具装柄技术，颠覆了长期以来“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保守、技术创新滞后”的传统认知，为揭示东亚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技术创新提供了关键证据。

关于该成果的研究论文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在线发表，再次证明东亚地区在全球人类演化研究中的关键地位。

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约30万至5万年前），是人类演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考古学研究将该时期多支系人群的复杂演化过程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系列标志性行为和技术创新相关联，如勒瓦娄哇及其他预制石核技术、工具装柄技术、定型骨器制作、个人装饰品和颜料使用等。然而，东亚地区的文化发展长期以来被视为连贯保守，核心依据



西沟装柄石器制作（倚靠式）复原图。袁崇皓供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是该地区的石器组合较为简单，重大技术变革仅发生在距今约4万

年后。中外专家学者通过对西沟遗址的

中国学者领衔的国际合作团队研究有新突破

颠覆对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技术传统认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年代与沉积环境、石器原料、技术、类型与功能等展开的深入研究，改变了传统认知。

研究确定西沟遗址文化层年代跨度为距今约16万至7.2万年，为研究该时期人类活动提供了相对精准的年代框架。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岳健平表示，研究通过技术与类型分析，揭示出西沟遗址石制品组合展现的兼具权宜性与组织性的石核剥片策略，而且这些技术并非简单的坯材生产，而是蕴含着明确的预设规划。

研究同时显示，遗址的石制工具呈现出专门化与多样性，包括刮削器、钻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多种类型。尤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通过技术-类型分析识别22件基部修理工具，并

通过微痕分析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工具存在明确装柄使用痕迹，这是目前东亚已知最早的由技术类型和微痕分析共同佐证的复合工具证据，将该地区装柄技术的出现时间大幅提前。

研究还显示，西沟遗址的石器具备丰富的使用功能。钻具可执行穿孔、锯、切割、钻孔等多种操作，部分工具观察到加工植物的痕迹；还有工具同时展现出雕刻、削刮等多种使用痕迹，这显示出古人类对工具多功能性的深度开发。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创新性的工具以石英和石英岩为原料，打破了石英材质不适合制作精细石器的传统认知，体现了古人类对本地原料的高效技术管理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指出，这一时期东亚正处于气候强烈波动的

背景下，古人类通过发展灵活多样的石器技术，形成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策略。该阶段东亚存在脑容量较大的史前人群，技术创新与古人类形态多样性、认知能力提升密切相关。西沟遗址的考古成果，不仅改写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传统叙事，提示学界重新审视以石英和石英岩为代表的东亚旧石器材料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为探讨人类体质演化关键阶段所展现的行为适应能力提供了重要案例。

岳健平表示，西沟遗址的发现并非孤证。近年来，中国多个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复杂行为证据。例如，灵井许昌人遗址的盘状石核技术、骨器制作、象征性刻划与赭石使用，萨拉乌苏和乌兰木伦遗址的装柄工具，云贵高原的勒瓦娄哇技术相关遗存和早期木器工具等，“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在约30万至5万年前的东亚，古人类已发展出包括预制石核技术、装柄技术、骨器制作、颜料使用等在内的复杂文化行为，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同期古人类技术水平和行为能力相当”。